

# 既成与生成：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思考

■陆杰华 郭荣荣

由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大转折所标识的人类迈向老龄社会趋同性革命的到来，对以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为基础的传统老年学知识体系形成冲击。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观察、解读、引领中国式老龄化进程，并以此观照全人类老龄社会治理的老年学学科自觉和必然归宿。本研究以知识生产具有的逻辑性、情境性和自主性三重本质属性以及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为理论逻辑起点，通过反思西方老年学知识建制的固化范式和发展困境，提出形成“老龄社会学想象力”可成为拓升老年学知识体系生命力，以推动老年学学科向高阶演化发展的突破口。在强调中西方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显著差异的前提下，提出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元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实践路径。

[关键词]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老龄社会形态；理论逻辑起点；元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4)07-0146-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战略协同研究”(21&ZD189)

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郭荣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北京 100871)

## 一、引言

社会大变革呼吁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丰富与壮大程度体现出社会发展是否成熟、国家实力是否强劲、民族文化是否自信，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建构出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富有启发性、解释力和引领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科学判断，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sup>[1]</sup>“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sup>[2][P43]</sup>等思想论断，并形成了《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等战略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重要构成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的发展成果,这一系列论述已经构成影响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底色和基调。

中国式现代化孕育于以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转型为标识的老龄社会新形态的加速演进态势,老龄问题始终是关系国家人口安全问题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进而影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从而关乎民生福祉、民族兴衰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复合型、共振型、战略型命题。因此,作为以解释老龄社会形态演变和结构变迁、揭示老龄社会运行规律和解决老龄问题为研究内容的老年学学科,其在中国发展主体结构从年轻型迈向老年型、跨过短寿时代迈向长寿时代、揖别年轻社会迈向更高位阶老龄社会的重大历史性现象下<sup>[3]</sup>,需要自觉以知识自主发挥学理优势与创新学科价值,形成扎根于老龄社会初期阶段发展实践经验和明显带有中华文明归属的知识建制与学科志向,以使得老年学知识生产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实践相匹配,老龄社会架构转变与社会形态演变相契合。

基于此,本研究从区分理解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标”和“本”出发,通过阐述当前老龄社会架构转变已滞后于老龄社会形态演进的非同步性特征,表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应对人类迈向老龄社会趋同性革命的老年学学科自觉。接下来,以人类知识体系的演进规律和社会科学知识权力的既有结构为线索,强调知识生产应具有逻辑性、情境性和自主性三重本质属性,以及应重申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以捍卫社会科学研究宗旨,而这也将成为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起点。进一步,通过反思西方老年学知识建制的固化范式和发展困境,提出形成“老龄社会学想象力”既可成为拓升中国老年学知识体系生命力的突破口,亦是老龄社会新秩序下每一个公民必备的心智品质。最后,在梳理中国老年学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以区分中西方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显著差异的前提下,提出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元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实践路径。

## 二、学科自觉:回应老龄社会架构转变滞后于形态演进的困境

从全球人口发展过程来看,世界人口年龄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的态势生成将是一场重大的人类趋同性革命。联合国于2022年宣布世界人口已达80亿,这一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人口规模增长史上的里程碑节点,标志着全球人口结构变迁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反映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突出表现为:全球老年人口占比增速自2015年后由每年小于0.1%增至0.2%,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自2014年达峰值65.6%后逐步下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22年的10%上升到2050年的16%,预计到2024年该比例将超过14%,即全球将进入老龄社会。<sup>①</sup>

### (一)老龄社会架构转变与老龄社会形态演进的非同步性不断强化

老龄社会是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来识别和以老龄化水平作为重要标识来判断人类社会形态的新概念图示,是指对应于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的社会形态。<sup>②</sup>人口年龄结构指标通常作为观察老龄社会的基线,只是老龄社会的“标”,与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应的社会架构则是理解老龄社会的“本”,即老龄社会形态交织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知识体系都将因迈向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展现出全新的运行模式与结构范畴。从老龄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来看,结合经济技术社会形态和人口转变阶段,在原始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阶段,与之对应的是青年型人口社会形态;进入早期工业化社会阶段,呈现出成年型社会形态;而后迈入后期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阶段,呈现出老龄社会形态。<sup>[4]</sup>然而,社会架构尚未有充足的时间与迈向老龄社会新形态的全球变革相互磨合,除了部分老年型发达国家,当前支

撑人口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架构基本是按照青年型人口年龄结构来构造的<sup>[5]①⑥</sup>。这就使得社会架构与社会形态的非同步性不断被强化,基于漫长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形成的传统老年学知识体系,对全面和客观解释如今具有压缩型、复合型、共振型特点的宏观结构变迁型老龄问题愈发显得力不从心。

## (二)中国老龄社会架构于理论指引和实践治理中展现的独特面貌

中国自2000年步入老年型社会,而后塑造的社会架构既延续了世界老龄态势生成对既有知识积淀和智慧凝练发出挑战的内在张力,亦颇具中国语境下的独特面貌,突出表现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乐观前景预期。

其一,以共同富裕作为引领老年人口全面发展的理论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发展生产力以保证有更多的物质储备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础上,强调在全生命周期中不断发展和积累以实现终生健康、终生参与和终生福祉,建立对老年人有益的支柱性、友好型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尚,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sup>[6]③</sup>据此指引,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安定团结两大发展奇迹的宏观环境下,我国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积极培育银发经济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推动老龄社会主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尤其以不断增强的老年人口素质和持续释放的老年人群消费需求为代表。例如,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首次成为全世界百岁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具有长寿代表意义的百岁老年人数量从2010年的每十万人中2.7人跨越式增长到2020年的8.43人;首次有半数以上的老年人自评是健康的,绝大多数老年人处于健康状态;离退休金、养老金首次成为中国老年人的最主要生活来源;<sup>[7]</sup>老年人口总消费预计将显著增长,其中由消费增长带来的贡献率为58.41%;预计银发经济规模占总消费和占GDP的比重将由2035年的27.8%和10.9%,分别提升至2050年的35%和15.9%。<sup>③</sup>这些历史性转变充分反映了将共同富裕作为老龄社会新常态下,对人口老龄化保有乐观预期的理论依据的正当性和必然性。

其二,以政策叙事推动老龄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新国情催生新国策,为积极应对在我国迈向重度老龄化社会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国家密集出台相关公共政策和部署老龄工作,形成了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并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由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来实现绩效最大化的老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我国老龄社会治理秉承以人为本的博大情怀和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兼具“建成不分年龄,人人共建共治共享老龄社会”的价值理性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全面现代化建设提供治理红利”的工具理性<sup>[8]</sup>。例如,“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作为引领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决策,有利于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间的关系;“发展银发经济以增进老年人福祉”作为人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联动战略举措,为应对老龄社会新常态和适应经济新要求提出了化解思路;<sup>[9]</sup>“持续推进数字技术适老化发展”作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有效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治理方略,将丰富数字中国战略下尊老孝老的新内涵。<sup>[10]</sup>这些策略均是在中国话语体系下,对如何建设理想老龄社会这一时代命题的积极实践探索。

概而论之,社会状况的改善和社会需求的调整,将极大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跨越式发展;由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大转折所标识的人类迈向老龄社会趋同性革命的到来,对以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现有知识体系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老龄社会架构转变滞后于老龄社会形态演变的理论困境,已向传统西方老年学知识建制的固化范式发起挑战;中国老龄社会治

理实践探索中蕴藏的知识品格和文化宏旨,将为丰富社会科学的公共意涵和型构长寿文明新形态提供借鉴。知识体系作为抽象化反映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学理性叙事,其具备全景式的知识结构和普遍性的解释范式,而自主知识体系则更进一步表明了知识体系的主体及其实践本源。<sup>[11]</sup>建构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将与作为实践形态的老龄社会治理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将创造和发展既有本土性又有普遍意义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提升老年学学科向高阶演化发展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将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并为人类趋同迈向老龄社会提供中国方案和东方智慧。

由此,探索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学派既是观察、叙述、解读、引领中国式老龄化进程,并以此观照全人类老龄社会治理的老年学学科自觉,亦成为构建人类老龄社会命运共同体,滋养长寿文明新形态的老年学学科的重要使命。

### 三、逻辑起点: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和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思辨性的、涉及意义诠释和价值权衡的论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命题,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同时,老年学作为隶属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其知识建制历程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特征,亦能反映社会科学知识权力的既有结构。因此,探寻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将以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和社会科学的鲜明特征为线索。

#### (一)人类知识体系的演进规律表明知识生产具有三重属性

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形成的观念、逻辑、方法等的集中体现;知识体系则是以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科、学术、话语等形态,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呈现出来的精神产品集群,其功能是反映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理解、解释甚至引领人类社会运行。<sup>[12]</sup>从人类知识体系的演进历程来看,每一次知识体系的变革或转型,都与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的变迁交织在一起,都是以回应每一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重大生存命题与发展诉求为导向。原始知识体系萌芽于奴隶社会,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阶段,与农耕文明形态相适应。近代工业革命和科学启蒙运动发生后,为服务于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形成了以现代化为导向、以实验科学和数理逻辑为支撑,用来解释工业文明进程和影响工业现代化,具有高度分科性和专业性的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其对世界知识话语权重心造成了“覆盖式”的冲击,形成了立基“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建构与传播之道。<sup>[13]</sup>这表明,知识并非单纯是经验归纳的产物,而是社会建构的必然结果。在波兰尼看来,“任何科学知识都奠基于地方性的‘默知识’之上”<sup>④</sup>。<sup>[14]</sup>反映到学术研究场域表现为,研究者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具有既是建构者亦是建构者这一双重身份的同质性。要回答中国如何自立于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世界知识权力结构,需要对“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关系作出诠释。

由此,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便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逻辑性,即强调基于社会发展经验和变革的实践基础,并将实践智慧完整有序抽离出来,通过提炼概念、工具、理论、方法等形成知识主轴和理论谱系。二是情境性,即知识生产根植于特定历史和文化,是由人们协商、对话产生的结果,其既与具体的社会制度、文明形态、历史资源等宏观构件密不可分,亦受到生产主体既有知识结构、研究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三是自主性,即在形式上遵守一般学术规则的前提下,以更加强烈的逻辑自觉、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在内容上建构更具本土色彩的精神产品。遵循坚定学术自主的价值立场这一导向,必须进一步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生产的显著差异。

社会科学是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对人类社会现象的差异化解释,是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研究。<sup>[15]</sup>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因民族和国家而存在显著差异,使得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更具有人为建构性,并由此决定了其本质上是一个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取向判断的精神产品生产过程。

## (二)重申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以捍卫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衷

在世界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既有结构中,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掌握着话语权优势,其以自由主义为思想背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假定,以价值中立性和道德相对论为价值取向,是面向自然物象的实用之学。<sup>[16]</sup>然而,面对21世纪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中的“重大议题”——消除贫困、良好健康与福祉、性别平等、缩小差距等<sup>⑤</sup>,基于工业文明经验的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已无法全方位解决人类面临的世纪性困境。以物品理论为例,区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是传统西方政治经济学阐释政府干预正当性以及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理论依据,但该理论在面对以数据为基础的数字时代时,就无法给予数据一个根本且上位的概念界定。以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既有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已难以适配当前飞速发展的数字治理实践。<sup>[17]</sup>更进一步,因知识体系承载的价值取向既关乎知识内里,亦影响着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只有在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文化宏旨作出判别的基础上,才能深刻洞察具体学科知识建制的鲜明特征。西方社会科学自19世纪晚期兴起以来,一直以探索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既有研究对此作出评判,指出其混淆了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两个概念:前者反映了人类的共同需要和利益追求,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和依存性,并且以承认彼此的特殊价值作为前提条件。而后者则片面夸大了西方价值观的共通性,以推行“普世价值”作为向其他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和意识形态扩张的工具。<sup>[18](P119-121)</sup>

因此,基于21世纪积聚的危机漩涡和面临的公共问题对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发起的挑战,有学者提出应重申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价值,使社会科学回到其发展的本衷,即对社会状况进行评估,促进社会和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约翰·布鲁尔在《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中提出,社会科学的产生是为了判断和改进社会状况,其具有生产关于社会的信息和社会再生产的媒介这两种特性,因此被贴上了公共物品的标签。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就是在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的社会属性中培养的一种道德情操,使得社会成员具备能够认识到彼此作为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以及能够同情远距离、被边缘化的陌生人的同情联想,通过理解、解释和改善累积下来的根本社会问题,从而产生对人类未来的共同责任。<sup>[19](P144)</sup>

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是对一系列紧密相连的未来工业、科学和经济变化产生的“大问题”而由此呼吁“大社会”的必要回应。其不仅为构建21世纪新公共社会科学提供了理论导向,推动重构当前由西方话语霸权形成的全球知识体系“中心-边缘”关系结构,以此来捍卫和坚守社会科学旨在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本衷,更是促使社会科学融入人道主义未来,通过培养道德情操和同情联想,唤醒公民自发肩负起共同责任和解决时代共同问题。

概而言之,由人类知识体系演进规律反映出的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以及由当前世界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发展困境产生的对社会科学公共价值的强力呼吁,将成为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起点。这不仅有力支撑着进一步挖掘拓升老年学知识体系中国学派生命力的元理论框架,亦科学引领着以增强主体性原创性彰显老年学中国气派的实践进路。

#### 四、突破既成:以老龄社会学想象力拓升中国老年学知识体系生命力

自1865年法国成为第一个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国家,以及1944年美国老年学会首次使用Gerontology作为老年学学科名称起,西方国家一直以领先世界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老龄化进程和以自然科学为导向的老年学知识架构,为人类应对老龄社会新形态提供参照对象和叙事框架。

##### (一)回溯和反思西方老年学知识体系的固化范式

回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老年学知识建制过程,因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整体以建立面向自然对象的实用之学为发展诉求的影响,其已构筑出理论与实践互相自洽的双元稳固支柱。第一支柱是在个人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视域下,对个人及群体的身体及健康进行控制管理的“科学理念”;第二支柱则是着眼于个体身体指标和具象化生命历程,为抵御疾病和延缓衰老发展出的一套“技术干预”。<sup>[20]</sup>具体表现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老年学学科的轴心定位和学理内涵上来看,强调如何以医疗手段和生物技术的主导力量,来消除早衰和延长寿命构成其学科追求。与老年人老化、衰亡直至死亡相关的年龄因素是西方老年学理论建构的核心要件;关注从细胞到个体再到社会与衰老相关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细胞、个体、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则是西方老年学固化范式的两个立论基础。<sup>[21]</sup>另一方面,从研究主题和关涉领域来看,年龄、衰老过程和老年人(age/aging/the aged)始终是西方老年学研究的中心主题,其分别指向关注生命周期视角下于特定年龄或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强调衰老的动态演化过程,以及如何看待被社会建构为老年人的群体。<sup>[22]</sup>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研究架构,形成了衰老生物学、衰老心理学、衰老社会学等知识产出。

然而,面对人口老龄化进程已由隐形和缓慢发展转向显性和常态化加速发展,老龄问题正从单一的个体或家庭问题转向关联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宏观结构性问题,老龄社会新形态将从部分发达国家的独特现象转向人类趋同性革命等一系列复杂巨变,当前西方老年学知识体系对其的解释愈发显得力不从心。

首先,西方老年学知识建制长期以来强调在微观视域下以消极面向来应对个体增龄过程中行为与心理层面上的能力萎缩、功能退化和体质衰弱等问题。对个体机能的狭隘过分关注,易忽视人口社会形态转变引起的宏观结构性变迁问题,从而导致学理内涵无法成为关键性的政策用语,将老年学知识体系与社会行动、生产生活、保障制度等割裂开来。同时,对衰老的极度恐惧和战胜衰老的强烈倾向,易走向将生命简化为充斥着生物过程的医疗化的客体这一误区,淡漠了知识体系的价值理性和文化品格。

其次,老龄科学研究整体处于数据丰富但理论滞后,聚焦现实问题导向却轻视理论问题导向的集体无意识困境。尽管已经形成了生命历程理论、累积优势和劣势理论等可以支撑老年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代表性理论,但这些理论普遍将探索衰老是如何在身体、行为和社会背景下发生连续性变化作为研究主题,并没有考虑如何从社会形态构建的角度去把握老龄社会的新颖性和独特性,更未能察觉来自基于短寿时代和年轻社会建立的旧秩序的崩溃,与重建适应长寿时代和老龄社会的新秩序之间可能面临真空的危险。以“人口负担假说”为例,在该理论主导下的老年学研究中,“衰老”已经成为“衰退”的同义词,表现为身体机能恶化、生产力下降、经济负担加重等,老龄化社会被视为劳动力萎缩和公共财政可持续性受到冲击的时代。正是这种预期的学理假设,产生了一系列预测劳动年龄人口发展趋势、养老金领取者规模增长幅度、公共支出和收入比对关系等

数据丰富但缺乏理论依据的研究成果。对此西方学者抨击到,“人口负担假说”引导了“空洞的经验主义”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到来。<sup>[23]</sup>

最后,福利国家制度难以有效应对限制老年学跨学科发展的结构性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为社会成员建立起涉及收入保障、贫困预防、个人发展与幸福等领域,覆盖“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的普适性社会福利制度。<sup>[24]</sup>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象征着社会进步并且已成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特征之一的福利体系,已面临新的社会风险并由此进行着内在机制性改革。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为例,其重要改革取向是通过延迟退休年龄促使劳动者延长缴费年限,以及建立和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来推行社会福利市场化改革。<sup>[25]</sup>然而,应对老龄社会新常态下的老龄问题,不仅需要以必须维持的财政平衡和不断上升的卫生支出为导向的经济领域的改革,亦涉及通过改革科研奖励机制和压倒性的实体资助支持来促进老龄科学研究跨学科的知识生产,从而为政策制定和实践应用提供理论依据。面对当前西方老年学跨学科发展中存在的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化有限、支持跨学科工作的相关机构缺乏、共享知识产权困难等结构性障碍<sup>[26]</sup>,迫切需要突破以提高退休年龄或医疗保健私有化来应对老龄社会福利依赖风险,甚至服务于特定利益阶层的改革倾向和价值取向。

## (二) 老龄社会学想象力将成为突破老年学发展困境必备的心智品质

通过对当前西方老年学知识架构予以反思可以发现,因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整体以建立面向自然物象的实用之学为发展诉求的影响,其建构的老年学知识体系的固化范式,已无法充分识别老龄社会新秩序下有效的福利体系和保障制度,亦无力回应老龄社会架构转变滞后于老龄社会形态演变的理论困境。因此,亟待建立起一套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以社会形态思维重新看待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的老年学知识建制与价值标准。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学科想象力。人类迈向老龄社会趋同性革命背景下个体增龄困扰与公共应对议题之间的巨大张力,将唤醒一种能够超越后工业社会制度框架中的老年学固化范式、厘清老龄社会新秩序下的不安与漠然、服务于代际团结所必需的民主政治的心智品质的产生。有学者将其称为“老龄社会学想象力”,这为探索将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概念扩展到解决老龄问题上提供了可能性。<sup>⑥</sup>老龄社会学想象力是每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在经历世界发展主体结构从年轻型迈向老年型进程中必备的心智品质,其对紧迫的公共论题给予道德上的价值关怀,将与发挥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所需要的道德情操和同情联想相辅相成,唤醒社会成员自发肩负起时代使命。<sup>[27]</sup>

运用老龄社会学想象力重塑的老年学知识体系,将以多样、异质的老龄社会形态作为基本理论预设,以关注人类迈入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以后究竟要去哪里的重大时代主题作为价值关怀,以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作为问题的提取方法,为寻找一种新的叙事框架来把握全球人口年龄转型过程提供了突破口,并以此提升老年学知识体系向更高阶演化的生命力。以形成中国老龄社会学想象力的自觉意识推动建构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能够延续西方老年学知识建制的合理性和彰显带有中华文明归属的知识品格,更是在一个以高度异质性为特征并且已成为重大时代主题的人类趋同迈向老龄社会的历史性现象下,开启对以公共意涵为导向且具有人文引领性的老年学知识体系中国学派及其实践路径的探索。

## 五、何以自主: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元理论框架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提升国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使命,

也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以理论建树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术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sup>②</sup>因此,唤醒社会科学研究主体意识和坚定学术自主的价值立场,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及其承载的“普世价值取向”的背景下,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如何用‘中国之理’引导的‘中国之治’来回答‘世界之问’”的时代任务和重要使命。

### (一)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区别于西方的显著特征

探寻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元理论框架及具体的实践路径,首先需要区分中西方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显著差异。一方面,从老年学的学科定位来看,自198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老年学学会标志着老年学学科生根发芽,我国老年学便承担了在认识人类老化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将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造福社会的社会职能。<sup>②8</sup>新时代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形态相互交织,使得人口安全新问题中的人口总量安全问题和人口年龄结构安全问题表现出复杂性、多样性、长期性特征。于是,在人口安全已关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老年学的学科定位将进一步提升为维护国家人口安全、保持经济社会活力和化解社会稳定风险,以及预见趋势、解释现实与探索方案。<sup>②9</sup>老年学知识体系亦将肩负起通过揭示老龄社会运行规律,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保障高水平的人口安全提供有效理论支撑的时代使命。另一方面,从老年学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来看,其建构过程经历了从探究生命衰老的生理病理规律,以老年医学为主的知识跟随时期;到密切与国际社会接轨,为打造完整齐备的学科体系奠定基础的知识引进时期;再到步入老龄化社会后,在经济社会决定论下探索中国特色老年学理论建设和实践逻辑的关键时期;最后是以面向国家战略的政策叙事,开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式革新与知识自主新时期。<sup>③</sup>

这表明,伴随老龄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我国老年学知识体系也实现了几个重要转型,即研究价值取向由负担论和悲观论转向财富论和机遇论,研究视角由着眼于老年期和老年人问题转向全生命周期视角、全人群视角和社会形态视角,研究选题由生命科学视角下探索个体衰老的单项研究转向多学科交融共同寻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道路的集成研究,研究话语权由国外经验借鉴和本土化移植转向建构体现中国经验和东方智慧的老龄科学研究话语体系,努力用规范的话语讲好中国解决老龄问题的故事。

纵览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老年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历程可以发现,其轴心始终围绕如何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始终遵循“两种生产”原理指导下人口生产必须要与物质资料生产相互适应这一人类社会生产的共有原则。虽然马克思对人类进入长寿时代和趋同迈入老龄社会等问题并没有专门的论述,但是其关于两种生产的观点,人类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以及对未来社会能够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愿景,已经体现了对人口老龄化的乐观预期。我国老年学知识建制正是由于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根本立场,并结合老龄社会形态演进和结构变迁的实际情况,才创造性地形成了以共同富裕作为引领老年人口全面发展的理论指南,和以政策叙事推动老龄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的独特面貌。正是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坚守具备大国之治博大情怀的学科定位,才使得中国老年学知识生产与老龄化社会实践形成良性的辩证循环。

### (二)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元理论框架与具体实践路径



根据知识生产的三重本质属性来搭建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元理论框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与“逻辑性”相对应的是建构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论”论述。即强调以老龄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对老龄社会发展规律不断深化的认识为基础,通过提炼标识性概念术语、基本假设、研究范畴等呈现出老年学的理论解释范式。此过程既需要自上而下理论推演和自下而上经验总结的双向奔赴,亦涉及规范建构与实证归纳之间的碰撞交流和交融。

其二,与“情境性”相符合的是建构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论”论述。即老年学知识体系是在特定的老龄社会文化生态中形成、承载着特定民族或地域的文化意蕴和价值取向的知识总和,由此使得作为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核心的文化自觉意识<sup>⑨</sup>,亦应成为人类趋同迈向老龄社会背景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的价值立场和学科志向。具体表现为:对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资源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以及发展趋向,并对其进行符合老龄社会治理实践要求和彰显老年学中国学派知识品格的形成、提炼与拓展,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理化发展,夯实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

其三,与“自主性”相匹配的是建构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论述。根据韦伯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其秉持积极的多元论哲学思想,要求科学的方法论的主旨应是解决实际问题 and 获取实在的知识,而非单纯地捍卫某种信念或倾向。<sup>[30](P11)</sup>据此指引,建构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应是基于中国老龄社会形态演变和结构变迁的特性这一“直接经验”,来检讨与修正西方老年学知识体系的固化范式和工具方法。主张在形式上遵守老年学共同体达成共识的一般学术规则前提下,更多地从“实地研究”和“质性研究”去发现老龄社会实践中的真问题,而不是一味墨守从现有理论出发,演绎性地形成假设,进而验证假设和理论的研究路径。

由此,中国老年学知识体系便拥有了可以支撑其“自主”于西方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底气,即以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老年学的学科定位为根本导向,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人口观为理论指引,以知识生产的三重属性和坚守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为理论逻辑起点,以遵循“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的思路搭建元理论框架,以形成老龄社会学想象力为必备的心智品质,通过厘清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关系以及揭示老龄社会运行规律,来回应并服务于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以维护国家人口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学科发展使命和民族国家利益。

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探索建构自立于西方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实践路径,需要在明晰四个研究范畴的前提下进而聚焦相关核心议题,以实现通过增强主体性原创性来彰显老年学中国气派。

第一,创新传统老年学固化范式以建立老龄科学研究综合范式。自觉推动老年学范式重构既是建构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任务,亦是对彰显老年学于长寿时代和老龄社会下的显学学术地位作出的理论回应。围绕该研究范畴,需要打破西方老年学以老年医学与自然科学为导向的学科分异和始终局限于年龄、老年人和衰老过程的知识建制,探索多学科整合研究的路径以形成老龄科学学科群,通过提炼具有逻辑自洽性的标识性概念、实践契合性的理论框架和提升老年学思维边界的分析方法,形成以老龄社会的运行逻辑、特有秩序和基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主轴。同时,需要营造理论包容、百花齐放的学术生态,建设中国气派的老年学理论谱系既需要平视世界各民族文化和西方老年学合理性的学科积累,也需要珍视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和老龄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创新老年学理论解释范式既要避免简单停留在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新形态中国实践的政策分析和规范性研究上,也要避免简单停留在思想性的批判和局部领域的知识创新上,而难以

将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具有实证特色的理论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建。

第二,将“三大体系”建设作为建构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厘清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构建布局合理的老年学学科体系、体现原创能力的老龄科学研究学术体系、融通中外的应对老龄问题的知识叙述话语体系,是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强力支撑。为此,一方面,需要完善学科治理机制和科研评议机制,表现为明确老龄战略优先研究领域和亟待攻关重大议题的时间表与路径图,以为应对老龄社会新形态培养高质量研究型与应用型人才为导向建立全生命周期育人育才体系,形成遵循学科发展基本规律的学科建设成效评估体系和完善以代表作评价为核心的科研评议机制<sup>[31]</sup>。另一方面,推进老年学知识生产的学理化阐述、学术化表达和大众化传播,不仅要依托中国老龄化国情和国策应对的案例和数据,充分借力新兴技术和虚拟现实等方式,实现老年学教材的体系化、本土化和数字化建设,亦需要跟进国际前沿老年学研究动态和把握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与分歧,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理想老龄社会的创新性研究方案,以此提升老年学学术成果的国际水平。

第三,以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国理政新时期,将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历史必然,也是对在人口发展战略中全面贯彻总体国家观的有效落实。与老龄社会新形态的全局性和复杂性相对应的一个好的治理格局应该是复合性的,其首先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内能够对老龄社会面临的问题和由此产生的需求做出全面协调的政策回应,也要求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能够对动态性的变化和新的问题与需求做出有效回应,尽量减少政策的滞后性和短期性。<sup>[32]</sup>对此,需要进一步夯实老龄科学基础研究,磋议与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现代化诉求和当前数字化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系统性学理知识,以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来保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战略目标。通过老年学知识生产与老龄化社会实践之间的良性辩证循环,推动形成融会老龄社会治理优势的“身-家-群-国-世”相贯通的整体性治理格局。<sup>[33]</sup>

第四,激活老龄社会的新人口红利和实现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以营造合宜的政策环境和制度条件来激活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数量型、质量型和配置型三类人口红利,并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的理论指引下,对如何实现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的有力回应。建构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深度酌量老年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发展,利用系统动力模型、经济计量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等研究工具,探索相关要素的递进关系与结构功能,来分析制约老龄社会状态变化的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传递的动因。

#### 注释:

①数据来源:陆杰华《全球人口破80亿!人口结构大转折带来哪些重要影响?》(北京日报客户端,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7752470687566303&wfr=spider&for=pc>)。

②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说,人类发展历史呈现出三种人口年龄结构形态,分别是青年型、成年型、老年型。老年型社会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老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7%~14%)、老龄社会(Aged society, 占比为14%~21%)、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 占比21%以上),也分别被称为轻度老龄化社会、中度老龄化社会和重度老龄化社会。参见党俊武《老年社会引论》(华龄出版社2004年版)。

③数据来源:吴玉韶《发展银发经济的“中国方案”》(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 <http://aging.fudan.edu.cn/contents/24/127.html>)。

④这种默会的知识无法客观、精确地被普遍界定和说明,而灵活地存在于不同文化和实践的情境中。

⑤联合国于2015年制定了17个全球发展目标,旨在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这17项目标分别是消除贫困;消除饥饿;健康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工业创新;社会平等;永续社区;永续供应;气候行动;海洋环境;陆地生态;机构正义;全球伙伴。

⑥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将这一概念表达为,“不安和漠然的境况,就是我们时代的标志性特征”“社会科学家在政治和学术两个维度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当代的不安和漠然都包括哪些成分。正是由于这项任务和要求,社会科学将日渐成为我们这个文化时代的共同尺度,而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将愈益成为我们最需要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我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以及自己又会遭遇什么。使我们有能力把握历史、把握人生,也把握这两者在社会中的关联”。参见C.赖特·米尔斯《米尔斯的想象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⑦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2.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2.htm).)

⑧四个时期对应的时间段分别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从2000年到2020年、2020年以来。参见吴洪涛《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⑨费孝通指出,现代化应当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即人类(包括学术人)从相互交往中获得对自己和“异己”的认识,创造文化上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局面的过程。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这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参见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与学科建设》(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 [参考文献]

[1]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01).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党俊武.人类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革命——加快推动中国气派老龄科学学科体系建设步伐[J].老龄科学研究,2023,(1).

[4]原新,金牛.中国老龄社会:形态演变、问题特征与治理建构[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Z1).

[5]党俊武.老龄社会引论[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4.

[6]杜鹏.中国老龄化社会20年:成就·挑战与展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7]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社会保障体系发展[J].社会保障评论,2023,(2).

[8]王永梅,杜鹏.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逻辑基础与重点任务[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

[9]金牛,原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基础、战略导向与路径选择[J].河北学刊,2024,(2).

- [10]杜鹏,韩文婷.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内涵、意义与实现路径[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2).
- [11]刘同舫.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N].光明日报,2024-01-26(11).
- [12]杨海英.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N].光明日报,2023-11-28(6).
- [13]唐亚林.中国知识体系自主性的构建之道[J].探索与争鸣,2020,(9).
- [14]郁振华.默会知识论视野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争——论波兰尼对斯诺问题的回应[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 [15]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J].社会学研究,2017,(5).
- [16]韩喜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必然与路径探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9).
- [17]郁建兴,黄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J].政治学研究,2023,(3).
- [18]吴洪涛.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23.
- [19](英)约翰·布鲁尔.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M].刘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20]朱荟.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老年学自主知识的政策叙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
- [21]Morgan,L.,&Kunkel,S.*Aging:The Social Context*.Thousand Oaks,California.Pine Forge Press,1998.
- [22]Alkema,Gretchen E.,&Alley,Dawn E..*Gerontology's Future: An Integrative Model for Disciplinary Advancement*.The Gerontologist,2006,(5).
- [23]Kellehear,Allan.*A Social History of Dy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 [24]吕磊,陈晓律.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以英国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6).
- [25]丁建定.“新社会风险”下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道路的新选择[J].社会保障评论,2023,(4).
- [26]Feldman,P. H., & Kane, R. L. *Strengthening Research to Improve the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of Long-term Care*.The Milbank Quarterly,2003,(2).
- [27]Ossewaarde,Marinus.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for the Aged Society*.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4,(2).
- [28]邹沧萍.老年学在我国是一门有现实需要的科学[J].老年学杂志,1988,(1).
- [29]朱荟,陆杰华.老龄社会新形态:中国老年学学科的定位、重点议题及其展望[J].河北学刊,2020,(3).
- [30](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31]张栋梁,邱滨泽,夏文莉.面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成效评价[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
- [32]敬义嘉.老龄社会的复合治理体系:对1982—2015年老龄政策变迁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0,(5).
- [33]胡湛,彭希哲,吴玉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J].中国社会科学,2022,(9).

【责任编辑:陈保林】